

【论 文】

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

——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¹

王欣²

摘要：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不断试图从学理上解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态，挑战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从所谓的“民族主义”、“全球史”、“新清史”的视角重新构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边疆理论，从而进一步加深其“汉人中国”的偏见。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应该被中国学界予以回应，而且应该注意到，客观认识历史上中国边疆形态的多样性与连续性特点，应基于中国多民族国家演变的自身实践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与体系。

关键词：西方学术；中国边疆理论；民族与国家

近百年来，西方学者不断从各个角度挑战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和边疆观，并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重新解读各种文本与考古和语言材料，在利用汉族中心主义和多民族共存的事实，解构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同时，力图建构各种重新阐释中国边疆形成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拉铁摩尔（E. Lattimore）³是20世纪上半叶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近30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边疆问题的日益凸显，本世纪西方学者更加关注中国边疆的形成，并以此解读当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代表人物便是狄宇宙（N. Di Cosmo）⁴和濮德培（P. C. Perdue）⁵。前者在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的背景下，多少还带有西方学者对中国边疆未知领域的了解和探索的色彩，后者则明显带有对中国崛起的关注甚至忧虑的意味。不管怎样，从学理的角度回应西方学者的各种边疆理论、学说与挑战都是必要的，而建构中国自己的边疆学理论体系，掌握话语权，则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仅就上述三位学者的一些论点谈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抛砖引玉。

一、

在构建中国的边疆学体系之前，首先要界定边疆的主体，即什么是中国，中国是谁的？从现代国际法的概念来看，这原本不是个什么问题。当代中国当然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边疆自然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范围所及的边境地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统一也有分裂时期，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此虽然也造成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国边疆范围的伸缩与变化，但是中国边疆的主要形态在近代之前却已基本形成。

¹ 本文原刊载于《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第40卷，第1-6页。

²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³ 拉铁摩尔的代表作是《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本文引文均据此本。

⁴ 狄宇宙的代表作是《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文均据此本。

⁵ 濮德培的代表作是《中国西征—清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一方面，中国边疆的基本形态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近代以来中国边疆是从历史上演变而来的，是对历史边疆的继承，具有历史的和法理的基础与依据；另一方面，历史上尤其是近代边疆形态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又的确对当代疆域的界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事实上，当代国际上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边疆演变史也莫不如此。问题在于，在近代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语境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学说成为西方学者解读和解构中国和中国边疆的学理基础。于是中国（China）是汉人或汉族（Chinese）的中国，中国的边疆是汉人的边疆，便成为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看法和观念。

拉铁摩尔在其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正文首页便列出了一张“中国本部十八省”地图，所谓的“中国本部十八省”主要指的是明代长城线以南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不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含西康，即今川西北的甘孜、阿坝州），甚至宁夏北部等区域。前者是他所指称的“中国本部”，而后者自然是他心目中的“中国边疆”。据此，拉铁摩尔又进一步明确认为，所谓的“中国本部”的面积约为150万平方千米，人口4 - 5亿间¹。显然，拉铁摩尔的“中国本部”指的是传统的汉人农业区，与历史上所谓的游牧或畜牧区域相对应；他的“中国”是汉人的“中国”，“中国边疆”指的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但是，即使按照拉铁摩尔的角度来讲，他有关中国和中国边疆的认识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混乱的。

首先，拉铁摩尔指的“中国本部十八省”是按清朝末年的标准划分的，满族兴起的东北地区并不包括在内，满族建立的清帝国并不是“中国”。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非汉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及其所统治的区域都不是“中国”，那么历史上的中国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概念了。一方面，在先秦甚至两汉时期，拉铁摩尔心目中的“汉人中国”王朝统治范围，并未能完全涵盖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全部；另一方面，唐代和明代“汉人中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又远远超过了“中国本部十八省”的范围。更何况历史上在“中国本部”区域曾经活动和统治过的还有很多非汉民族，而他们大多都与所谓的汉人相融合，本身就成为了后来汉人的一部分。就中国历史上而言，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其疆域都有伸缩变化，汉人与非汉人的活动区域也各不相同或多有重叠之处；加之不同时期汉人的内涵也有变化，汉人与非汉人、非汉民族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的，因此以汉人和非汉人定义“中国本部”，显然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更与事实不符。

为了解释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拉铁摩尔别出心裁地根据中国南北方在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将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前汉族”，因为他们有着与汉人相接近的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易于与汉人相融合；而北方少数民族则称为“非汉族”，因为他们有着与汉人不同的草原生态环境和游牧生产方式，不易于与汉人相融合。他认为，“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前汉族’的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在北方，汉族的发展把保留的少数民族推到了一个新环境中。在那儿，他们不是‘前汉族’而成了‘非汉族’”²。而事实却恰恰与拉铁摩尔的学说相背离，直到近现代，中国南方依然是少数民族成分最为丰富的地区，而历史上却有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最典型的就是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不乏大量的游牧民族，他们似乎更像是拉铁摩尔所谓的“前汉族”而非“非汉族”。

其次，拉铁摩尔选取明代长城作为历史上中国北部疆域的一条“绝对边界”，完全无视明代长城以北的千年前秦代长城的存在。尽管他注意到了长城两侧，由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造成的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差异，但他显然将这些东西也绝对化了。更何况即使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带宜农宜牧，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绿洲地区也适于从事农业生产，而无论什么时期，长城也没有成为

¹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²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绝对边界”。

为了说明中国西北疆域的形成过程，拉铁摩尔继“前汉族”之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次级绿洲”的概念。这片“次级绿洲”的东部位于他所指称的“中国初民所在的黄河河曲及附近的谷地”，西部则是“新疆的绿洲”。拉铁摩尔认为，“在东、西部中间，有一片可称为‘次绿洲’的地带，特别是在甘肃西部，从兰州向西，沿南山北麓直到安西，从安西开始是艰苦的沙漠道路，西北直至哈密，再西到罗布泊。这个地理区域可以加上流入蒙古腹地的额济纳河地区和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地区。这种所谓的次绿洲（在新疆北部或准噶尔盆地也有这种绿洲）的特点是，虽然它们之间的交通情况不如黄河河曲谷地那样好，却比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强得多”¹。拉铁摩尔提出“次级绿洲”的概念无非是为了说明，这里的居民与汉人不同，并在汉人农业文明的扩展下“脱离绿洲而完全依赖草原”²，成为所谓的非汉的“蛮族”，因而这一区域原本并不是汉人“中国”的，而只是汉人“中国”的边疆而已。其最终目标是据此“有了一个研究汉族渗入中亚的重要着眼点”；虽然拉铁摩尔不得不承认“这个地区终究是由汉人控制的”，但他却强调汉人“虽然可以控制，却永远不能使这些地区与汉地合为一体”¹，从而将这一区域排除在他所谓的“中国本部”之外。

拉铁摩尔在此显然过分夸大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已经使得中原与河西诸绿洲成为一体，而此后西域都护的设立及其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则将汉朝的疆域推进到中亚地区。至于汉代以后各王朝西北疆域的伸缩则与其各自势力的兴衰以及周边民族的活动密切相关，并非是拉铁摩尔所强调的“次级绿洲”作用的结果。

造成拉铁摩尔在“中国”与“中国边疆”认识上时空混乱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将中国等同于汉人的“中国”；将中国和中国的边疆视为一种静态的存在。这一点与近代以来某些日本学者所鼓吹的“异民族统治中国”的学说倒是异曲同工。显然，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显示出其对中国历史复杂性认识的浅薄。一方面，所谓的汉人本身就是历史上多民族的一个融合体，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并不存在绝对“纯正”的汉人；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非汉民族（包括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统治过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区，并通过民族融合成为所谓汉人的一部分。所以，以汉人及其活动区域来定义中国甚至等同于中国，既没有历史的依据，也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易言之，中国从来就不是或不仅仅是汉人的中国，而是历史上在这一区域生活和活动过的各个民族共同的中国。此外，随着王朝的更替及其势力的盛衰，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在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观念引入之前也一直处于伸缩与变化状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以所谓的“中国本部”来界定中国的边疆，不仅有先入为主之嫌，也将复杂多变的边疆演变史简单化了。

二、

如果说拉铁摩尔是立足近代中国已经基本定型的边疆来反观其演变过程的话，那么狄宇宙则是从早期中国北部疆域的形成入手，试图从代表古代中国的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二元对立与互动的视角，解构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这一点，只要从他著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的书名及其所研究的历史时段——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100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狄宇宙看来，“边疆地区是这样一种地区，不同的民族，其对生活、社会和道德的理解迥然有别，而且构成他们自身和确定他们的民族性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边疆还是这样一种地区，它是建立在那些使用文字和不使用文字的人之间的（从而证据就具有片面

¹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²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性)”。²显然,狄宇宙是以民族和文化来定义边疆的,这一点与拉铁摩尔并无本质区别,和古代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历史也不相符,其出发点仍然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学说;另一方面,狄宇宙对早期中国边疆的看法也脱离了先秦时期便已形成的“天下观”和“大一统”的语境,而这种“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无疑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在对待中国边疆的形成问题上,以所谓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视角解构“天下观”和“大一统”思想下的“中国中心主义”,一直是近百年来,包括上述三位西方学者在内的西方学术界的不懈追求。这一点也得到了许多华人世界学者的欣赏和认同³。从多视角透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边疆,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边疆的形成,深化本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心与边疆原本就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不存在没有中心的边疆,而脱离边疆的中心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有的边疆都是有中心的。问题在于,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中国仅仅是汉人的中国,“中国中心主义”于是便成了“汉人中心主义”;而在“汉人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体系的共同作用下,“非汉地区”就成为了“中国”的边疆。将历史投射到现实,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北(所谓的“满洲”)自然便不属于“中国本部”,而成为“中国本部”之外的边疆了。

在近代之前的王朝时代,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一中心的周围自然形成了不同时代伸缩变化的边疆,但是这种边疆并不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民族—国家”语境下的边疆,而是具有自身内涵和特点的边疆。就中心而言,该中心从来就不仅仅是所谓“汉人”的中心,历史上就有很多“非汉”民族入主中心,并大部分与汉人相融合;就边疆而言,不同时期的一些汉人也以各种形式流寓边疆,最终成为“非汉”民族的一部分。“入主中原”不仅是历史上汉人的理想,也是许多“非汉”民族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上所谓的“中国本部”不仅仅是汉人的中心,也是许多“非汉”民族的中心;边疆也不仅仅是“非汉”民族活动的场域,也是所谓的汉人流寓的地区。汉人与“非汉”民族的双向流动以及“非汉”民族间的相互往来,事实上也打破了按照民族标准界定的所谓中心与边疆的二元划分。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学者以民族活动场域划分古代中国的边界与边疆的话,那么所谓的“中国本部”反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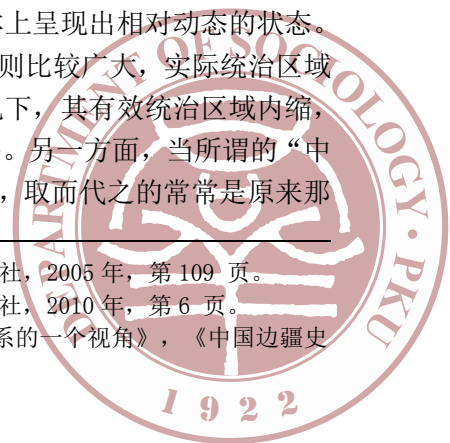
需要强调指出的,王朝时代的中国边疆具有自身的多重属性,即政治边疆、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所谓历史上中国边疆便是这些多重属性的复合体,并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各自不同的场域和特定的含义,因之也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

所谓政治边疆,指的是各朝代相对“中心”而言实际统治或控制的边缘地带,是其政治势力所及的有效范围,具体表现在统治体制及各项统治措施的有效延伸,诸如军事驻扎与屯戍支撑、郡县制度的推行与羁縻府州的设置,以及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认同等等。与此同时,在政治边疆的范围内还常常会设定特别的职官制度,代表“中心”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的管辖与控制,从而会出现一些“次级中心”。正因如此,政治边疆的一个最为显著特点,便是政治制度的多样性。由于“中心”各王朝所处的历史环境、内外形势和统治实力各有不同,其有效统治或控制范围自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范围在整体上呈现出相对动态的状态。一方面,当“中心”王朝实力与势力强盛的时候,其政治边疆的范围则比较广大,实际统治区域便呈现出“大一统”的状态;在“中心”王朝实力与势力衰减的情况下,其有效统治区域内缩,实际控制范围便比较狭促,原来的政治边疆常常处于分裂与割据状态。另一方面,当所谓的“中心”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情况下,统一的政治边疆自然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原来那

¹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² [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³ 参见薛涌《狄宇宙的华夷新辨》,《书城》2009年5月;李鸿宾《阐释南北关系的一个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些“次级中心”，在不同的区域维系着各自的政治边疆，等待着下一轮“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会随着王朝的更替、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形势变化而处于动态状态下的话，那么政治边疆相对稳定以及复归一同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的形成与确立。与政治边疆（很大程度上与各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直接相关）不同，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的形成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延续性，并与该区域内各族民众的内在需求密切相关，即使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各种形式的族际间经济与文化交流仍然在民间延续；两者的场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边疆相重叠，但是其自身的发展却一般并不因政治边疆的变化而中断和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甚至可以说，正是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的这种内在连续性与稳定性，才构成了政治边疆形态的形成和恢复直至重建的基础。

与拉铁摩尔静态的考察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同，狄宇宙则强调中国边疆的“流动性特征”，并认为“在北部边疆的确定上，至少有三种相互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一种是生态和经济进程，另一种是文化进程，最后是政治进程。”他甚至承认，“文化边疆，这一被理解为是不同物质文化的承载者之间进行接触的地域，早在商代就存在于中国北方了”¹。

事实上，狄宇宙正是从早期华夏农业文明核心区域与北方民族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史前至西汉时期中国北方边疆形成过程的。在他看来，正是文化的界限最早（周王朝）将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形成较为明确的“边界”；随着统一了游牧部落的匈奴和统一了中国的汉王朝的兴起，“当边界作为匈奴和中国之间的界限开始以地域的和政治的名义而被确定下来之后，边疆关系就开始通过朝廷之间的沟通、外交使团的派遣以及互换贡品等活动而固定下来”²。

狄宇宙的贡献在于将中国边疆形态的形成与确立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又将中国的古代边疆视为一个经济（生态）边疆、文化边疆和政治边疆的“综合体”，并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解构了司马迁历史文本书写（《史记·匈奴列传》）所构建的中国北部边疆体系。狄宇宙虽然通过司马迁有关“天人感应”的书写，成功解读了以之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天下观”在构建北部边疆形态上的作用，并且也认识到这一时期“这一条边境不能认为是由生态环境或生活方式的深刻不同所造成的。华夏民族、戎、狄和夷等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但同样的差别也存在于各诸侯国之间”，从而避免落入西方学术界以往简单以生态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和民族差异界定中国古代边界与边疆的陷阱，但是他却依然认为“这一政治性的边界到战国末期随着北方‘城墙’的建立而向北扩展到了极限”³。显然，一旦回到政治边疆的语境下，长城作为中国古代边疆具有符号意义的边界，其在界定中国古代边界与边疆上的功能与作用同样也被狄宇宙夸大和绝对化了。从中国古代边疆完整的演变过程来看，且不说秦朝统一六国后在阴山北部所建长城的地理位置远远超越了战国末期北方诸侯国的“北方城墙”的极限，没有建设长城防线的唐朝和清朝的政治边疆的范围反而分别达到了历史上的两个极限和顶峰。因此，长城充其量只是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王朝政治边疆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边界符号，其兴建存废与范围的伸缩反而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边疆动态发展的历史特点。至于狄宇宙所称的“早期长城的基本功能是进攻功能的理论”⁴也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狄宇宙的发明和创造。拉铁摩尔早就认为，是汉族的发展而不是蛮族的入侵才导致早期中国北部疆域形态的形成⁵。在这一点上，拉铁摩尔与狄宇宙等西方学者的表述更像是为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纠偏，对于全面认识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及农业王朝国家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关系也不无积极地学术研究意义，但是这种纠偏却常常滑入另一个绝

¹ [美]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8-59页。

² [美]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0-371页。

³ [美]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

⁴ [美]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

⁵ [美]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



对和极端，即“去中国中心主义”。事实上，拉铁摩尔与狄宇宙等一些西方学者有关古代中国边疆的各种学说和出发点在整体上也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三、

如果说拉铁摩尔和狄宇宙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偏重其历史过程的话，那么濮德培的研究则带有显著而强烈的现实关怀情节。在上述三人中濮德培所著的《中国西征》（*China Marches West*，副标题为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清朝征服中央欧亚）尽管晚出，但是他的研究在“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上却比前二者走得更远，并明确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学说提出挑战。

濮德培在本书的“前言”中毫不讳言地说：

我选择‘中国西征’作为本书的书名是很慎重的，因为这是一个被当今中国民族国家所认可的征服事件。但它是‘清的征服’（*Qing Conquest*）而不是‘中国的征服’（*Chinese Conquest*），因为其中主要参与者里有很多并不是汉人中国人（*Han Chinese*）；之所以选择‘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一词而不是更常用的‘中亚’（*Central Asia*）、‘蒙古’（*Mongolia*）或‘新疆’（*Xinjiang*），是为了表明帝国获取这片领土的范围之广、疆界之模糊。

针对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清代多民族国家对蒙古和维吾尔人的统一”以及俄国人和蒙古人所说的“好战的满清对蒙古人的入侵”等说法，濮德培认为其中都有政治的含义，因而都不是中立的；为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既要批评民族主义，同时也要证明帝国与民族国家间的延续性¹。

《中国西征》一书主要讨论的虽然是清朝17至18世纪对西北边疆的征服问题，但是濮德培在该书“导言”中也明确指出：本书还对现代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某些主导范式提出批评，这些范式主要见于中国学者的著作中，但也被很多西方学者所接受。简而言之，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都受到了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将中国民族国家现在的疆域和文化边界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他们将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视为某种发展的成就，并在20世纪的中华民国达到顶峰；或者按照中国人的话来讲，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民众。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在1800年左右，清帝国版图的扩张达到顶点，因为这一扩张过程从此终结。此后，帝国在19世纪从其荣耀的顶峰开始衰落，直到1949年才重新恢复了绝大部分区域的主权。

尽管中国民族主义者将满人视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而加以排斥，但是中国民族国家观念中的疆域概念却派生于18世纪清帝国扩张的最大版图。与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中国人也是在排斥的基础上构建过去的²。需要指出的是，濮德培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近十几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兴起的所谓“新清史”学派的继承和延续。

该学派虽然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研究观点以及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的使用上有所突破，但是却仍然无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片面突出和强调满人建立的清朝与历代部分所谓汉人建立王朝的差异，以“满人中心主义”替代“汉人中心主义”；其本质上依然是西方学术界在民族—国家理论以及汉与“非汉”二元对立背景下审视和解构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的延续，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其“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学术追求。

在上引濮德培的“序言”中，他强调“清的征服”并不是“中国的征服”，直接原因居然是征服活动的参与者中“有很多并不是汉人中国人”。按照他的逻辑，清朝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

¹ P.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IV.

² P.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 ~ 2.



因为其建立者是满人，那么所谓的中国只能是“汉人中国”；这种将“清朝”与“中国”、满人与汉人截然相对立的看法，甚至还不如濮德培曾研究过的雍正皇帝在《大义迷觉录》中所驳斥过的“华夷中外之分论”。易言之，甚至清朝统治者也清楚地意识到，满族虽然建立了清朝，是清朝的统治民族，但是清朝并不仅仅是满人的清朝，中国也不仅仅是满人的中国。为此，雍正帝在《大义迷觉录》中还特别论述到：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¹

显然，雍正强调明朝取代元朝的合理性，目的无非是为了表明清朝统治者是以明朝的后继者和中国的代表者自居的，是中国的“再造者”。在“天下观”的语境下，这种中国的“再造者”无疑是超越“华夷”或“满汉”之别的。“新清史”学派当然自我标榜是“以满族自身为研究主体”纠偏以往的“汉族中心研究方式”，但在学术实践中却或多或少地、有意或无意偏离了这一立场，其“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企图昭然若揭。

濮德培在“导言”中以民族主义的影响为由，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编纂主导范式提出批评和挑战，但是他显然忘记了所谓“民族主义”恰恰是近代以来从西方输入的；以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范式批评中国传统的主导范式，一方面脱离了近代前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的场景、语境与规律，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了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事实上，辛亥革命以后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是为了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回归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的轨道。此外，无论历史上的王朝时期还是近代中国，都是在继承过去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的国家体系与边疆形态，而并非“在排斥的基础上建构过去”。濮德培的上述言论无非是为了割裂历史上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与继承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当代中国疆域的合法性。

在当今世界，领土与边疆的归属，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神圣而不可侵犯；承认各国疆域的现状，尊重主权国家的既有疆域范围和主权完整，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之一。任何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违背这一准则的行为，显然是与之相悖的，而这样做即使不是别有用心，那么也与通过学术研究促进人类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宗旨相背离。

古代中国边疆的范围虽经不同时代的演进而时有伸缩变化，但其基本形态为何却完整地延续地保存到近代并为当代中国所继承？在“去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理论背景下，拉铁摩尔和狄宇宙等西方学者并未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解说，甚至完全回避乃至无视这一历史事实。濮德培在自己著作的最后倒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更多的却是对此表示特别的“惊讶”，并轻描淡写地将之归于“很多偶然因素的结果”²而一笔带过。与他前面的长篇大论相比，这样做显然是很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在当前建构中国边疆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回应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挑战，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古代中国政治边疆、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的视野出发，充分认识和评价无形的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在有形的政治边疆形态发展和演变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规律，从而阐明当代中国边疆的历史延续性与合理性。这样或许在学理上有助于我们建构完整、科学并具有自己独立话语权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夯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学说。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学人的责任，也是使命。

¹ 雍正：《大义迷觉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² P.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65.

